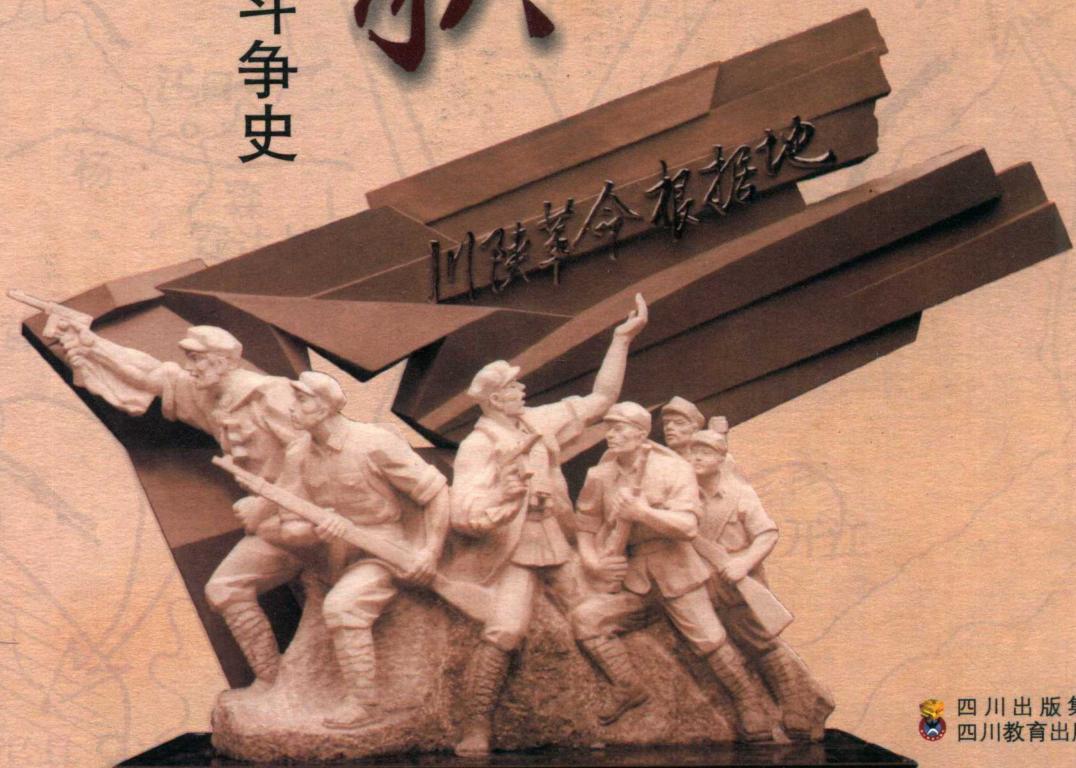


四川博物院◎主编

# 西行壮歌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 西北行歌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四川博物院◎主编

坝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 四川博物院主编.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408-5534-5

I. ①西… II. ①四… III. ①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史料 IV. ①  
K269.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3392号

责任编辑 张纪亮  
装帧设计 何一兵 王凌  
责任校对 刘江  
责任印制 黎伟 黄萍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90mm×260mm  
印 张 19.5 插页 3  
平装定价 6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调换。电话：(028)86259359

营销电话：(028)86259477 邮购电话：(028)86259694

编辑部电话：(028)86259381

# 《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 编 委 会

---

主任：郑晓幸 刘金田

副主任：盛建武 雷 华 张爱茹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 越 陈以政 陈志学 相瑞花 夏燕月

谢志成 魏学峰

执行主编：盛建武

正文撰稿：（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蛟 王 萍 付 琳 刘金田 张爱茹

相瑞花 鹿海啸

插图说明文字撰写：

陈以政 张 蓉 郭军涛 彭代群 李 媛

巫雨静 辛 艳 刘 敏 成 吟

配图及文字编辑：

陈以政 郭军涛

# 序

郑晓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全党、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开展隆重的纪念活动之时，由四川博物院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正式出版了。

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到川陕边，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区疆域拓展到东起城口、万源边境，西至嘉陵江东岸，北抵陕南宁强、镇巴，南迄营山、渠县的广大地区，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红军从入川时的1.4万余人发展到8万余人，拥有10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建立了23个县和1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权。

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川陕苏区在两年多的革命斗争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大力发展经济，保证军民供给，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支援革命，促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苏区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和抵御了四川军阀和蒋介石、胡宗南部的多次进攻，打破了蒋介石“川陕会剿”的美梦，成功运用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和“主动出击，积极防御”等战略战术，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特别是根据党中央部署，全力配合与掩护了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

“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巍巍巴山，历史丰碑；英雄儿女，民族脊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苏区人民输送了12万优秀儿女参加红军，有4万余人英勇牺牲，长眠巴山，巴山人民为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与奉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川陕苏区的党和政府，领导群众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实践与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党和人民培育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西行壮歌——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一书，以大量珍贵的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详尽记录了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一部全面反映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历史的史书，同时也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它的出版，是对无数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是对川陕苏区人民的深情告慰，更是对红军精神的高扬彰显。纵览全书，必将激励我们继承光荣传统，发扬红军精神，万众一心跟党走，团结拼搏谋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2011年6月



## 第一章 川陕曙光

- 1 川陕边人民的苦难生活
- 7 川陕边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14 川陕边早期的武装起义和暴动
- 19 川东游击队的早期斗争
- 22 黄麻起义和红四方面军的建立
- 27 红四方面军西征
- 31 小河口会议
- 36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
- 42 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 46 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 第二章 烽火燎原

- 53 粉碎“三路围攻”
- 59 木门会议
- 62 三次进攻战役
- 70 川东游击队的斗争与红三十三军的建立

## 第三章 谱写新篇

- 75 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 80 川陕苏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87 川陕苏区群众组织的发展
- 95 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 100 苏维埃政权建设
- 106 土地法令的颁布
- 113 平分土地与查田查阶级运动
- 120 红军的教育与训练
- 128 地方武装的建立

132	根据地的妇女武装	275	附 川陕革命根据地著名人物
137	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李鸣珂 李家俊 畅继勋 余笃三
142	工商贸易的恢复与发展		任玮璋 曾中生 余天云 罗南辉
161	文化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郑义斋 杨克明 孙玉清 陈海松
167	根据地的戒烟运动		李 特 黄 超 赵明恩 刘子才
	<b>第四章 鏘战巴山</b>		罗世文 熊国炳 倪志亮 陈昌浩
173	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		张琴秋 王维舟 张广才 王树声
174	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		张国焘 王建安 袁克服 徐立清
176	根据地反“六路围攻”的准备		曾传六 王新亭 周纯全 许世友
179	粉碎敌人第一期总攻		李天焕 刘瑞龙 傅 钟 徐向前
183	粉碎敌人第二期总攻		程世才 余洪远 李先念 詹才芳
184	粉碎敌人第三期总攻		陈再道 王宏坤 张才千 吴瑞林
186	万源保卫战		秦基伟 陈锡联 何正文 傅崇碧
195	东线全面反攻		洪学智 李德生 向守志
199	西线反击的胜利	299	<b>川陕革命根据地区域图</b>
	<b>第五章 战略转移</b>	300	<b>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战役示意图</b>
205	蒋介石策划“川陕会剿”	301	<b>插图索引</b>
208	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303	<b>后 记</b>
212	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		
218	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		
224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		
232	广昭战役		
236	陕南战役		
241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		
250	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254	懋功会师		
259	巴山游击队的继续斗争		
	<b>第六章 丰碑永存</b>		
271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		

## 川陕边人民的苦难生活

川陕边地区，是指米仓山和大巴山之间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广大地区。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物产丰富，人民勤劳。但在封建统治和压迫下，人民生活极其贫困。20世纪初，这里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之一。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

就这样，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土匪等几股势力既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使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川陕边地区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当时的四川，一些川军头目，经过连年战争，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形成了各派军阀势力。以派别言，有川、滇、黔军阀在川争斗，还有刘存厚、刘湘、杨森、刘成勋、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省内军阀混战。以兵额言，合国军、省军、边军三者，共有18师、37旅又10余团，不下25万人。1919年，四川开始实行“防区制”。之后，全省逐步形成六个主要防区，各军阀统领的军队都有防区，分别为：成都、川中、川南及原西康东部一带为军阀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防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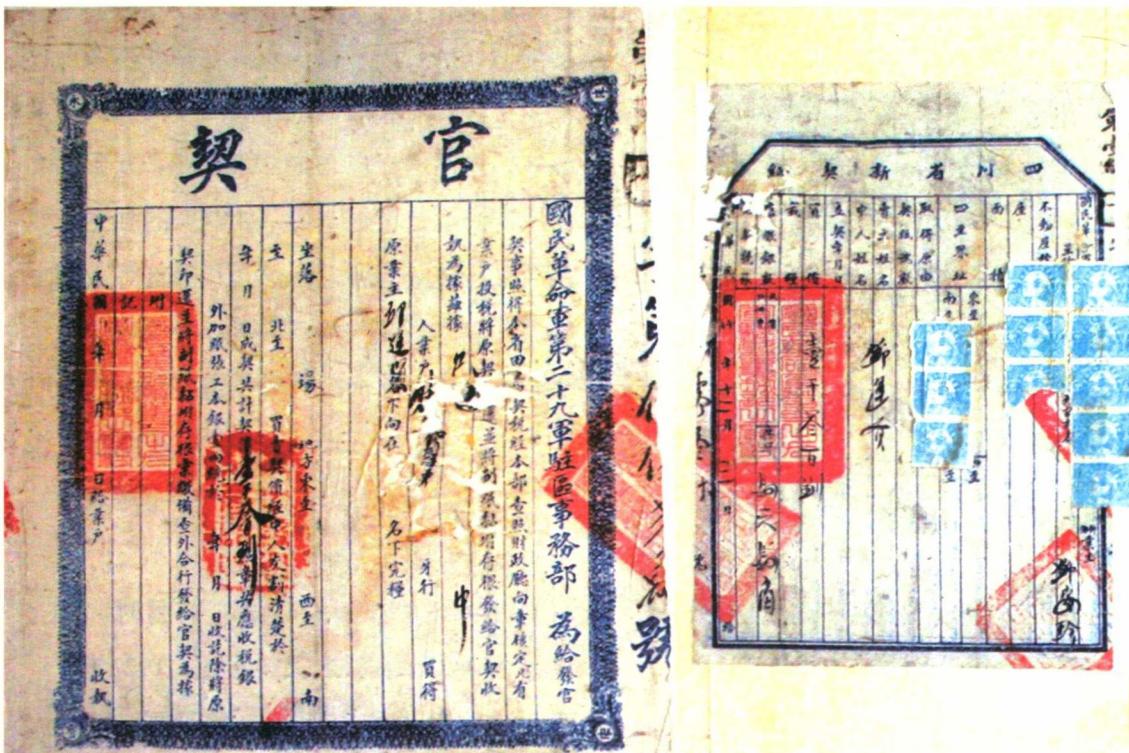
庆及川东一带为军阀刘湘二十一军的防区；川西北一带为军阀邓锡侯的防区；通江、南江、巴中、阆中等川北20余县为军阀田颂尧的防区；达县、宣汉、城口、万源是军阀刘存厚川陕边防军的防区；营山、渠县、岳池、广安4县是军阀杨森二十军的防区。各个防区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各派军阀在其防区内，掌握着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他们自立法律，自委官吏，自征赋税，称王称霸，就像封建诸侯，把一个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搞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1912年到1934年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70余次，平均每月两次。<sup>[1]</sup>军阀混战的胜负，使防区随之变化，防区内的行政官吏也不断更迭，并政出多门。据记载，从1918年到1923年，巴中县相继被5个军阀统治；万源县知事从1917年到1931年间更换了20个；宣汉县在15年中更换了32个知事，平均不到6个月换一个，其中有个知事仅当了9天的官。他们残酷镇压人民、剥削群众，竭力维护一地的军阀统治，方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和四川的“防区制”如出一辙，1921年7月，军阀刘镇华独揽陕西军政大权后，颁布了“区治村治”章程，以排斥外来势力，并加强其反动统治，从而使陕西的分

裂局面发展到了顶峰。1921年至1925年，北洋军阀陈树藩、吴新田相经述治陕南。1927年以后，陕南的军阀割据日甚一日。1928年，冯玉祥部张维玺师到陕南赶走了吴新田。1929年冯玉祥倒蒋，张维玺部东进，冯部王志远旅驻汉中。不久，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又派其第十七师孙蔚如部第五十一旅进驻陕南。这期间，川军刘存厚部、田颂尧部曾一度窜入陕南，分别盘踞于西乡、城固、洋县、镇巴及宁强、勉县、略阳一带。一时间，各派军阀各占一地，明争暗斗，陕南的政局十分动荡。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以各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之间，矛盾空前尖锐，战争连年不断。为了进行混战以扩大防区，各地军阀大肆征收苛捐杂税。当时，四川全省名目繁多的捐税达七八十种，居全国之首。其中川东北各种捐税不下百种，有田赋、契税、验契税、佃当税、盐税、茶税、渔业税、护商税、百货厘金、斗息、秤息、屠宰税、桐油税、傍粮捐、子弹捐、火线捐、壮丁费、马路费、种烟捐、月儿捐、瘾民捐、被服捐、统捐、血毛捐、船捐、杂货捐、店铺捐、烟平息、军饷、公债、借垫、诉讼费、招待费、送礼费、造路费等等。军阀田颂尧统治的川北，对不愿种植鸦片的农民，还要抽所谓“懒捐”。正税之外，不定期临时派下来的“附加”又往往超过正税。而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官契

官契在民间被称为“红契”，是指房地产买卖双方当事人经向官府呈报、备案、纳税后得到官方认可并加盖红色官印的一种契约。

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驻区事务部颁发的官契，上有契约双方的墨书签名，上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驻区事务部之关防”红色方印。

大多数附加，都落到“公务人员”的私人腰包里。田赋更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逐年增加。由初期的一年三征，激增到1931年的一年十四征。邓锡侯的防区内，在1931年已预征到1961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1933年竟预征到了1983年。<sup>[1]</sup>如此苛重的田赋，广大农

民不堪重负，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也难交清捐税。农民交不起赋税，军阀官吏常常施以捆绑、吊打、关押等酷刑，有的农户交不出捐税而被吊打时，还需给吊打费，许多人因此被活活打死。

陕南地区同样如此。旱灾最严重的1929年，汉中地区的灾民达157万余人。又时逢瘟疫流行，宁强、城固、南郑、汉阴等县遭受水灾，造成百姓大量死亡。统治者却无动于衷，反而更加紧对灾区人民的

[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编写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掠夺。这年5月，全省每县摊派的军粮，竟达数千石至两万余石之多。还额外派党捐、保甲费、差捐等几十种苛税。保安队每日下乡催逼，农民纷纷逃亡避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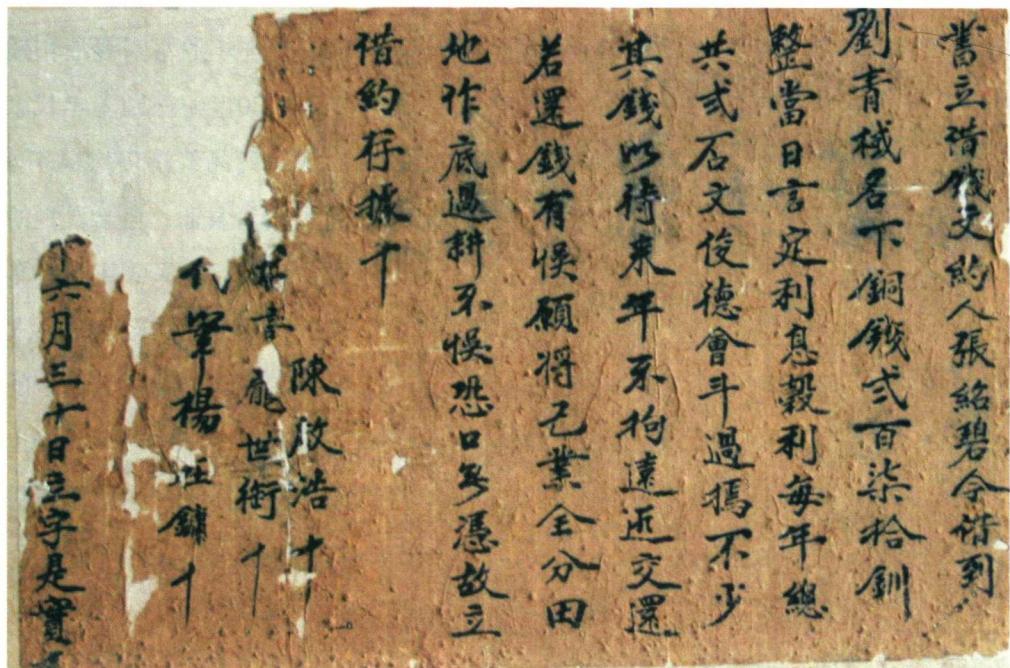
连年的军阀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凡是军队经过或驻扎的区域，无不强迫民船做运输，抓农民当挑夫，拆毁民房造工事，抢农民的柴、米、鸡、牛、猪做军需。1928年底，杨森残部逃到渠县，为解决士兵的军衣，下令百姓只能穿短服，派士兵持剪刀把守县城四门，凡穿长衫者，即强行剪去半截，留作军用。同时强行控制渠江沿岸的盐运和销售。1928年到1932年，陕南大部地区连续五年遭受旱灾、虫灾，各派军阀却不顾

人民的死活，照常拉丁派款，强夺人力、财力，展开罪恶的混战。四川军阀为扩军混战，规定：一户之中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事实上是没钱送包（贿赂）的独生子也要强行抓捕。团总、保正、牌首等人乘机敲诈勒索。无人当兵的农家，强收“壮丁费”。若在一个区域内拉不齐分配的壮丁数目，遇着四五十岁的农民也要绳捆索绑，刮了胡子凑数。被强拉去穿上军衣的农民，成千上万死在战场。

在军阀疯狂掠夺、敲诈的同时，封建地主则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1922年，四川省农民人均土地一亩零四厘，陕西省农民人平三亩八分。占总人口85%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总耕地面积的

苏维埃採取統一的累进稅法，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稅法，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不敢採用或者不敢徹底採用的。至于國民黨的稅收，則是一篇絕大的糊塗賬。其稅收原則是主要取之農民及其他小有產階級。正稅之外，有無數的附加稅。據天津大公報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統計，國民黨區域內捐稅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種之多，而四川的田賦預征到了一九八七年。陝西的田賦比國民黨未到時增加了二十五倍，這是國民黨對於勞苦民眾的“恩德”！

民国时期的苏维埃出版物转引《大公报》有关田赋征收统计的报道



### 借约

图为农民张绍碧以田地房屋作抵，向财主刘青械借债的借约。纸质，墨书，从右至左竖书。

百分之十几，而占人口9%~1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4%~80%的土地。土地占有悬殊的结果，不仅使社会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而且就连旧有的中小地主在与大地主争夺土地的斗争中也日趋破产。破产农民别无他路可寻，只得被迫以高额的地租，佃租地主的土地耕种。佃农或半佃农在川陕边农村占总农户的40%~50%。在土地集中度较高的地方，特别是城镇附近，还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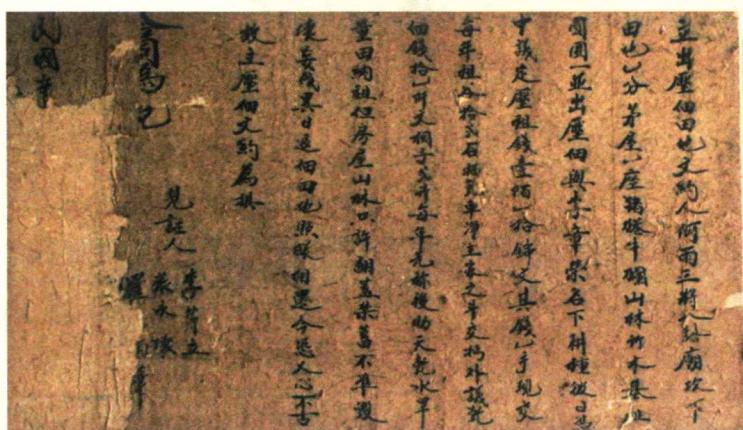
高利贷者和投机商人也乘虚而入，对

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川陕边区的贫苦农民，在无法交纳捐税、押金、租谷，或在青黄不接、苦于吊打时，被迫向高利贷者告贷，一是“借粮”，二是“借钱”。借粮，往往是春借一斗，秋还二斗或三斗；借钱，一般月利率是5%~10%，多的达20%。川东北的投机商人还往往同高利贷结合在一起，趁农民缺钱断粮时，高价出卖谷米给农民，低价收购丝茧、茶、棉、麻、烟草、木耳、木料、药材等，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使农民蒙受更大损失。

广大农民除了受军阀、豪绅、地主的种种压迫、剥削外，还常遭土匪、盗贼的抢劫。川陕边区土匪、盗贼极为猖獗，当地的土匪头子大多都与地方的官绅或军阀勾结。官绅军阀坐地分红吃福，包庇纵容土匪。农民忍受不了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的敲诈勒索，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处是“房屋无人住，田地无人耕”的凄凉景象。

巴山蜀水，广袤秦川，原是富庶之

地，但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和残暴的封建统治，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川陕边区的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仍然极不发达，90%以上的人从事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在军阀和封建地主的租、捐、役等条条绳索的勒索下，人民饥寒交迫，背井离乡，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在重重压迫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川陕边区广大人民，时刻盼望着曙光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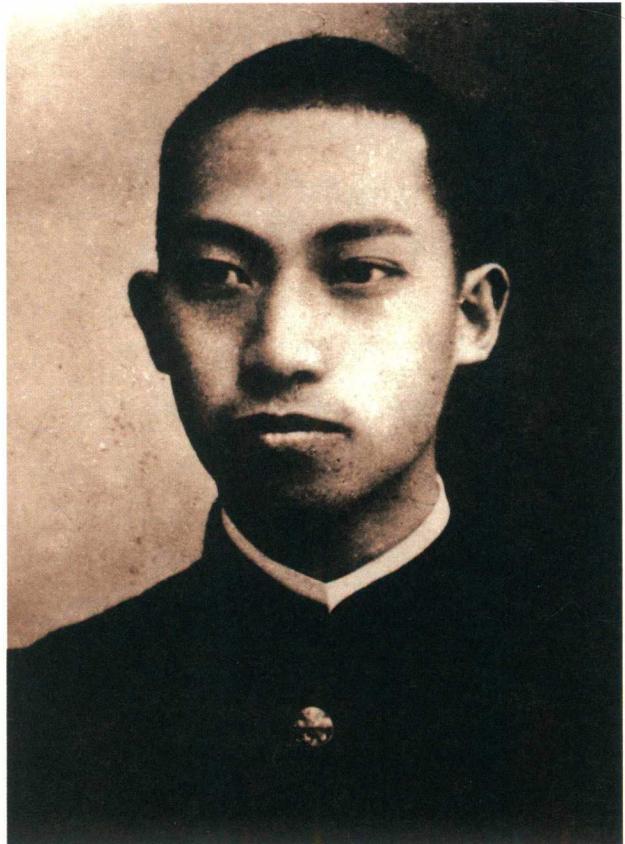
王子惠十  
周德人周明印十  
王子明十  
荷德三事十  
己卯年五月二十九日立字十

信岩边大田地  
出耕苟大偿名不耕教不责国大偿承  
信復耕大田边宗山海田砍各耕族  
革任大族研代耕程遇革让借族  
十年刑行一公若有黑言有中  
人明印革承担元字为数十

## 佃约

图为两张农民向地主承佃土地、房屋等所立的佃约。纸质，墨书，从右至左竖书。

吴玉章



## 川陕边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川陕两省先后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川陕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摆脱苦难生活的曙光。

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不断传入四川。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首先反映在知

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从1921年开始，一批四川籍的革命者陆续回到四川并来到川东北地区，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最早到川东北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吴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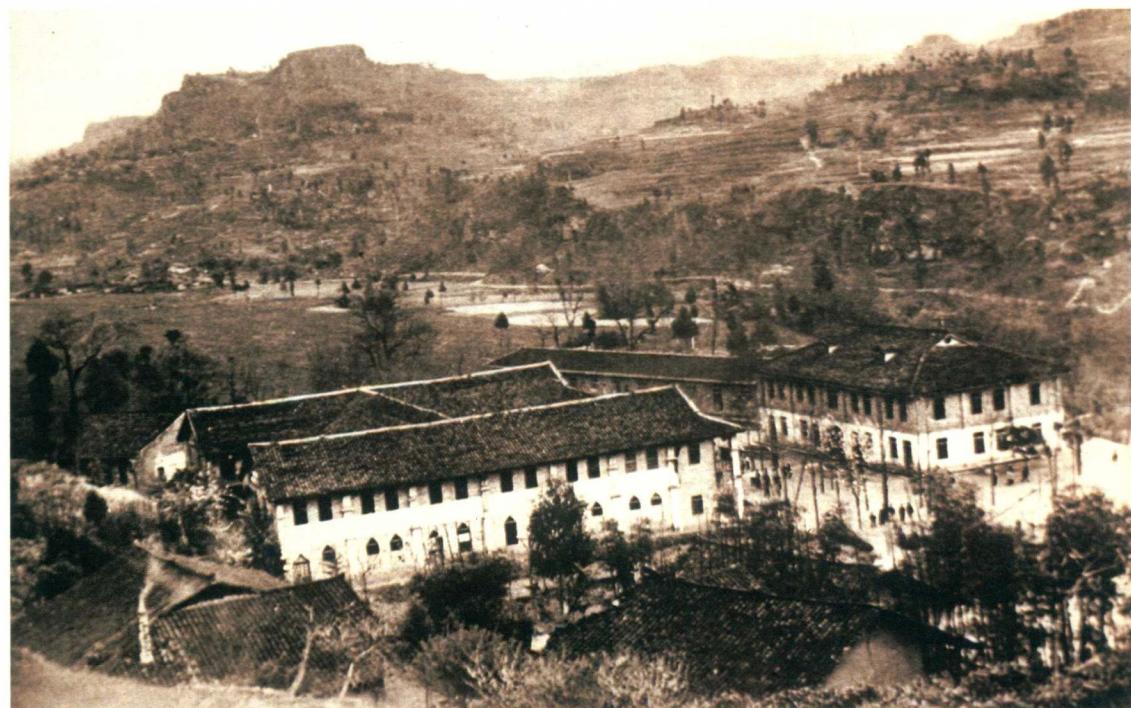
吴玉章，四川荣县人，1903年东渡日本，谋求强国之策。接受民主革命思想，1906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八年，革命活动不断。回国后先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和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培养人

才。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为培养革命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五四运动时期，吴玉章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1年冬，吴玉章到达县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最早使川东北的进步人士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两年后的1923年，曾和吴玉章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另一位四川籍革命者王维舟，回到家乡宣汉县，开始在宣汉、达县一带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从事革命活动。此前，王维舟深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1920年5月加入旅华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年底到苏联伊尔库



王维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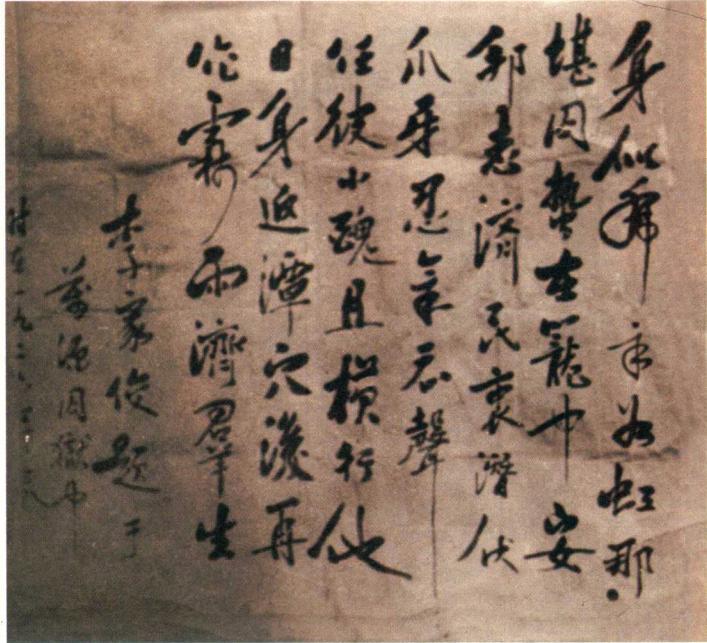


宣汉清溪宏文小学

1923年王维舟从苏联学习归国后，到家乡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创办宏文小学，培养青年骨干，并在该校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图为宏文小学旧址。



李家俊



李家俊狱中题词

身似虎，气如虹，那堪囚蛰在笼中。安邦志，济民衷，潜伏爪牙，忍气吞声，任彼小丑且横行，他日身返潭穴后，再作霖雨济群生。

茨克学习。1922年初回国，在北京协同吴玉章等组织赤心社、俄灾赈济会，募捐并宣传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王维舟回到家乡后，在宣汉清溪场创办宏文小学、文化书社和农民夜校，培养青年骨干，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同时在清溪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了党的活动。

1924年，四川万源县的李家俊从上海回到家乡固军坝创办小学，宣传进步思想。他还创办了《尊山钟》报，宣传革命理论。其间，他曾因率学生冲击县政府而

被捕入狱，留下了正气凛然的词句：“身似虎，气如虹，那堪囚蛰在笼中。安邦志，济民衷，潜伏爪牙，忍气吞声，任彼小丑且横行，他日身返潭穴后，再作霖雨济群生。”<sup>[1]</sup>

1926年3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吴玉章负责宣传工作，冉钧负责组织工作。随后，各种进步组织纷纷建立，进步书刊广泛发行，革命报刊不断创办。这年3月，陈毅

[1] 198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